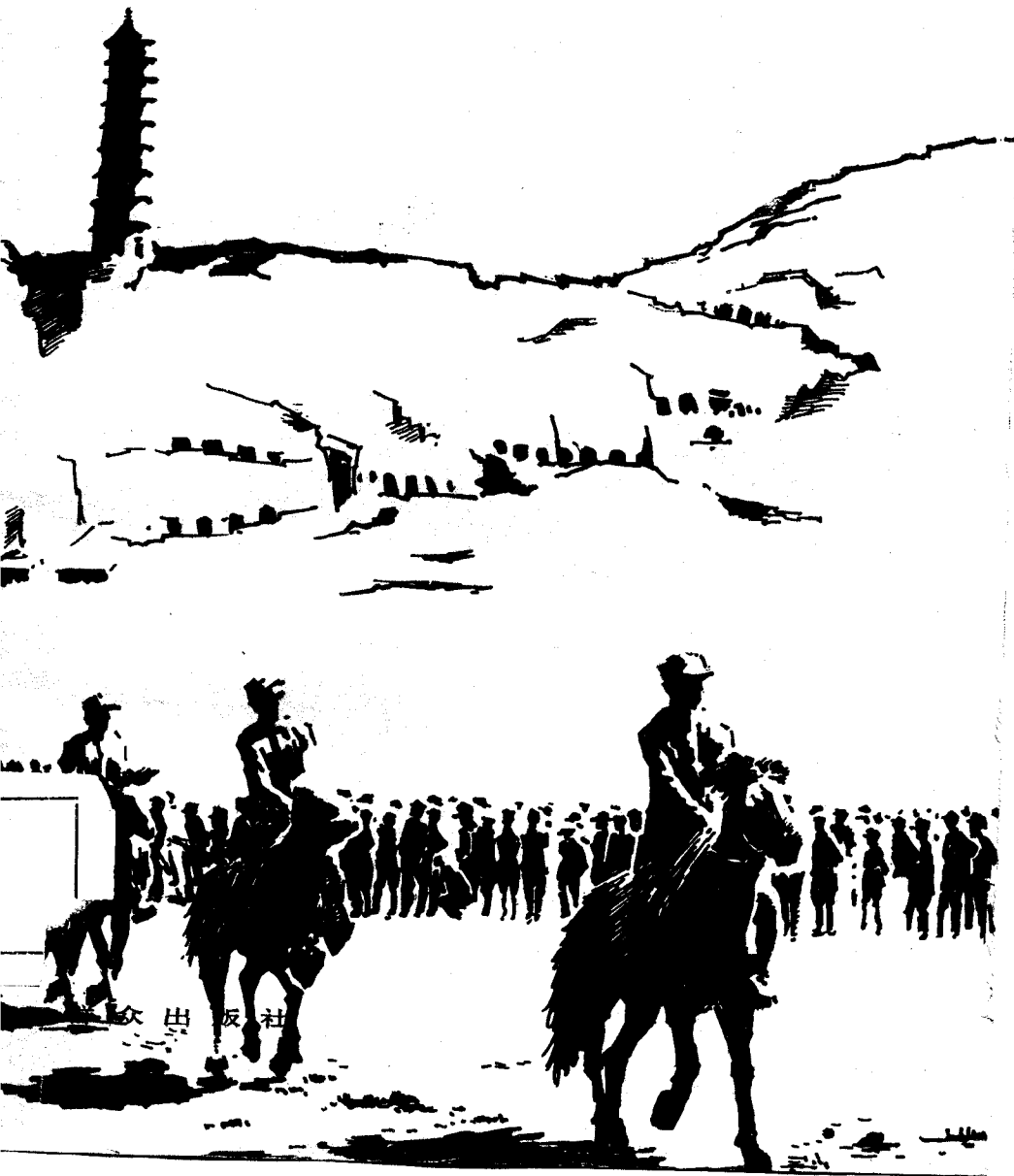


# 红色中国杂记

(美) 埃德加·斯诺



群众出版社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by  
EDGAR SNOW

---

本书系根据美国哈佛大学1957年版译出

**红色中国杂记**

(美)埃德加·斯诺 著

党英凡 译 高思永 董斯美 校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30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3067·173 定价：0.65元

(内部发行)

~~~~~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 译 者 的 话

《红色中国杂记》一书，是埃德加·斯诺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的邀请下，根据1936年、1939年两次访问陕北苏区的部分笔记，于1957年经过整理和编写而成。书中内容过去未曾发表过。此书记载了我党政军领导人的大量谈话、简要传记、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中共党史、中美关系、斯诺生平和思想的珍贵文献。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等原因，书中难免有失实甚至错误之处，其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年代、知名人士的出生年月以及引用的一些资料，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为保持本书的原貌，我们除了对极个别十分明显的人名、地名的拼写错误做了订正外，其他基本上照译原文未加改动，望读者阅读时加以分析和注意。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刘渝、曹建林、翟卫华、张琦、杨玉生、陆文颐、廖心文、邓丽丽、孙羽、何迪以及凌虹等同志。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一定存在不少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2年4月

---

## 目 录

序 ——约翰·费正清	1
作者前言 ——埃德加·斯诺	4
<b>一 西安事变的新资料</b>	
1 来自保安的明信片	10
2 同X的谈话	11
3 莫斯科在张学良问题上的“错误”	12
4 苗凤夏(?) (苗剑秋)的叙述	16
5 博古谈西安事变	23
<b>二 博古(秦邦宪)</b>	
1 个人传略	26
2 1936年10月在保安的访问	30
3 1938年7月23—24日在汉口的访问	32
a 对《西行漫记》的批判	32
b 关于领导权	34
c 关于党的组织	35
d 学 校	36
4 重庆会谈	37
<b>三 林 彪</b>	
1 个人传略	38

2	对江西战事的评论	40
<b>四</b>	<b>肖劲光</b>	
1	个人传略	44
2	访    问	45
<b>五</b>	<b>土地革命</b>	
1	王观澜	46
2	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及其实践	47
<b>六</b>	<b>国家治安</b>	
1	周    兴	53
2	国家治安问题及司法	54
<b>七</b>	<b>宣传鼓动部</b>	
1	吴亮平谈江西	58
2	宣传鼓动部的工作	61
3	对白军俘虏的政策	62
<b>八</b>	<b>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b>	
1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	63
2	活    动	64
<b>九</b>	<b>周恩来</b>	
1	谈蒋介石	69
2	陕西和江西	74
3	谈未来的计划	75

<b>十 刘 晓</b> .....	78
<b>十一 毛泽东</b>	
1 几句题外话（1939年重返陕西）.....	84
2 毛泽东和张国焘.....	88
<b>十二 洛甫论党</b>	
1 论托洛茨基主义.....	96
2 革命的阶段.....	100
3 社会主义和外国企业.....	100
4 其他问题.....	101
a 党的建设.....	101
b 党 员.....	101
c 恐怖与战斗统计.....	102
d 新占区的布尔什维克化.....	103
e 罪犯的待遇.....	103
<b>十三 陈赓的传记</b>	
1 大革命时期.....	105
2 被捕和脱逃.....	108
3 陈赓和蒋介石.....	109
4 “抗拒诱惑”.....	111
5 谈话片断.....	113
6 逃跑还是.....? .....	114
<b>十四 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损失</b> .....	116

十五	台湾人	120
十六	彭德怀将军谈中国与世界形势	122
十七	和红军在一起	128
十八	归途中	138
十九	罗斯福总统论中国	144

#### 附录 人物简历

钱信忠	151
朱 瑞	152
肖 华	152
徐向前	152
李富春	153
刘昌汉	154
聂鹤亭	154
聂荣臻	157
邓小平	158
邓 华	158
蔡 畅	159
左 权	160
王 明	160
王首道	161
杨至诚	164
杨得志	164
叶剑英	165



---

# 序

---

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特别是有关自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分裂，到1937年统一战线建立的十年期间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活动情况的资料，为数极少，是十分珍贵的。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所以在那些年月所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除了共产党官方以追述方式写出，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报道之外，历史学家只得较多地依赖旁观者写的报道，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三十年代中期特许从共产党领导者们本人那里采集资料的新闻工作者所撰写的报道。

在那个时代里的所有记者中，埃德加·斯诺是出类拔萃的。1938年他写的《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引人入胜，并附有作者为书中人物拍摄的照片。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那时，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已成为美国不共戴天的大敌，而东西方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尚未继德日之后成为美国的死敌，因此《西行漫记》一书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

《西行漫记》描述了一场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当时局限在边远贫瘠的农村。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冲破了江西的围剿，经受了长征的磨难，开始着手与共产国际制定一项旨在同爱国人士合作，反对民族共同的敌人的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夏天至初秋，斯诺采访到本书中的故事。当时共产党总部设在陕北保安，尚未搬到延安。这正是采写红色中国冒险故事的天赐良机，使他能在短暂的安宁中追忆红色中国浴血奋战的业绩。

到1936年，埃德加·斯诺已在中国度过了七年记者生活。他第一部著作《远东战线》描述了日本侵略满洲、华北和上海的情况。1934—1935年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学的同时，他学习中国语文，直接考察了中国学生的生活和思想。1936年6月当他获得访问新的红色区域的机会之时，他已作了几年的业务准备，不仅要去报道重要的内幕消息，而且要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贡献。

《西行漫记》还记录了毛泽东主要的个人经历（第一版第111页至167页）。在这部四百五十页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记下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十五年的主要情况；这些记载多少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这也是一个准备充分而且才华横溢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的范例。

1956年，我们发现斯诺先生仍存有二十年前记录在他笔记本里但从未使用过的材料。于是我们敦促他发表其中几部分，作为研究的辅助材料，结果就出版了这部书。它与其说是为了普通群众阅读，不如说仅仅是为了供学者进行研究。我们感谢斯诺先生。他欣然将这些笔记补充进在反映一个重大的并处在形成阶段的历史时期所可能获得的极少的第一手报道中。

这部书中有些内容是第一次公布于众，例如它提供的有关红军长征的资料，是斯诺先生在准备《西行漫记》手稿时就已采集好了的。书中的一些传记体资料，同样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闻

记者尚未发表或没有使用过的。还有一些内容，例如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谈话记录，虽是在后一些年采集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表过，顶多只是零散地引用过。本书第一章中关于西安事变当时的记述，为我们提出了在那次著名的危机中对于莫斯科与延安关系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有趣的看法。

约翰·费正清

序于1957年9月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邓斯特大街16号 中国经济政治研究所

---

## 作者前言

---

培根先生说过：“旅行，对青年人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则是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在他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前去这个国家旅行，那么他是去学习，而不是去旅行。”

象所有的好的警句一样，这警句也是一种夸张，其中说到的事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要是我们承认其中有一点正确性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说，我1936年（这本小册子主要与这一年有关）在西安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所作的访问，既是教育又是经历，既是学习又是旅行。当时我30岁——这个年龄用“青年人”已太大，但还没有老到称作“老年人”，尽管我学会了一些汉语，但是要做专业工作而无人相助，还是不行的。

通过孙逸仙夫人的帮助，我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他们安排我秘密进入红军控制的西北地区。我被告知我能在苏区“首都”（保安）得到一个翻译，但如果我自己带一个翻译来，就更好了。我派人到北京去邀请一名中国青年作家和我同行，他在我离开西安之前赶到，但临行前他改变主意又不愿意去了。我只得不带翻译上路。不过我写信给我妻子，要求她想法由两个燕京大学学生的朋友中动员一个来和我一起工作。王汝

梅（他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改名黄华）接受了我的邀请，他在我已经到达甘肃西部“前线”时终于赶到了。

我进入红色地区后遇见的第一个能讲英语的中国人是周恩来。他负责指挥东部“前线”。我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过他，本书中也将再次写到他。他为我提供了一支武装护卫小分队，于是我向保安进发。在保安我见到了毛泽东。那里还有好几位能讲英语的共产党人，吴亮平（见58页）是其中之一，在正式访问中，他被指派担任我的翻译。但他不能陪同我一路西行。不过在王汝梅赶来之前，我身边是一直没有译员的，我返回保安时也没有译员，而且就在本书结尾部分描述的“归途”中的那一星期内，也同样没有译员。

吴亮平在我对毛泽东所有的正式访问中担任翻译。在我对保安的其他不能讲英语的重要官员的访问中，也是由吴亮平担任翻译。毛要求我用英文详尽地记下他讲的一切。吴将这一记录翻译成中文，然后由毛修改、补充和校订。当时我坐在他和吴的身边写下最后的译文。本书中谈到的对周恩来的访问（第一次）的情况是：我一边写下谈话内容，一边纠正周的英语（周的英语已很荒疏），然后把记录读给周听，并作进一步校正。而我通常的习惯作法是：除了需要澄清问题或纠正翻译的句法外，我逐字逐句地记下人们对我谈及的一切。

在我对西北地区为期四个月的访问期间，往往只有一些零星的边界战斗，而且政治活动不多，领袖们正在等待四川的红二方面军的到来，以制定新的决策。因此安排访问我所希望会见的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困难。一旦得到开诚相待的命令，他们都欢迎多年来第一次和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人交谈的机会。

那时，每句话我都感到新鲜和增长知识，哪怕是生硬的宣传也是如此。我把听到的一切几乎都记录下来，手中的钢笔或铅笔经常从清晨不停地写到深夜。接连几个星期，毛泽东几乎每晚都

同我谈话。这些谈话经常在晚饭后大约九或十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我睡着了为止。

白天，我总是带着一、两个袖珍笔记本，匆忙地在上面写点评论。对一些正式的约会，我用较大的本子记载。那上面我还记日记，大都是详尽记录我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我为每本从五十页到一百多页不等的十六个本子编了索引，通常用工整的字迹写在纸的两面——因为书写纸在那里是难得的商品。遇到某个名字看起来很重要或者对某个字有疑问时，我就要求谈话人或译员给我写出中文来。（后来我后悔没有更经常地这样做）

除了我的笔记本外，我还收集其他情况，并按要求写出来给博古、吴亮平、李江林、陆定一以及别的人。在我回北京后，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已翻译出来，予以发表或收藏起来。我着手附带做的另一项工作，是编写长征的历史，红军为我提供了关于这方面的几十份稿件。我把它们增补到已写出的故事中去。我现在仍然热切地希望，将来能写出一本关于这一史诗般的壮举的书。

在本书中，所有传记材料都是本人对我谈话的记录，不是本人谈的我都加以注明。圆括号内的注释是访问时记下的（例外的已注明），谈话人的随意插话之类，不一定与问题有直接的关联。有几处是我自己在访问中附带说明的话。缩排的部分，包括资料和注释，是我这次增写的。我把我与罗斯福谈话的回忆呈交罗斯福夫人过目，请她更正一下在这些问题上同她所了解的或她印象中她丈夫的观点有抵触的地方。她很客气，回答说：她看“没有要订正的”。至于那些旅行日记是根据我本人的见闻、同战士和农民的直接交谈，利用等待中较长的间歇时间详尽地记载下来的。

这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试图检查我的笔记或想删改它们。唯一能记起的一个例外，是周恩来要求我不要公布他对蒋介石的评论。他们要求我不要向“敌人”泄露有军事价值的情报。我当然

被告知了一些应该保密而我确实保着密的事情。有一、两次，毛泽东要求我在红色地区时就把他的谈话写成文章。我争辩说，我的编辑<sup>①</sup>和读者不会相信用那种方式送到他们那里的任何材料，所有的报道必须在我返回北京后写出。毛对我的看法的合理性作了让步，没有坚持他的意见。

毫无疑问，由于我不熟悉情况，失去了许多获得有价值资料的机会。去这个地区之前，我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有关这些共产党人的一切材料，但极为零碎、不确切而且靠不住。我仅知道一些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姓名，国共关系的历史以及由外部观察到的中国内战情况。弄清人物情况以及谋篇成章费了我一些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给了我最大帮助，使我在离开保安与部队接触时，已相对地很“了解情况”了。

关于“西安事变的新资料”，遗憾的是：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我感到还是保持“X”的匿名为好。因为尽管我相信此人不再会反对向历史学家公开这些资料，但我仍然没有得到不用匿名的许可。我发表这些资料的理由不是因为我记得苗先生对西安事变后果的看法必定正确，或共产党执行的方针必定错误，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资料同其他的资料密切有关，处处都似乎特别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思想。例如，彭德怀的论述：“你不能直接达到目的时，就要走曲折的路。”

在正文里，我没有尝试系统地评价西安事变资料；但在文中，我至少对它们随意发表了一点评论，因为这也许对那些有志研究中国命运中这一历史性转折事件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现在看来，共产党可能曾鼓励张学良扣留蒋委员长，他们驻

---

<sup>①</sup> 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太阳报》没有采用我这次旅行采写的报道，《每日先驱报》采用了。——原注

西安少帅司令部的首席代表（刘鼎）同领导事变的青年军官们往来非常密切。政治局最初打算利用这一事件在西安建立民族抗日政府，即使不能使他们国内的最大敌人蒋介石威望扫地，至少也要孤立他。莫斯科的突然干涉动摇了先前的计划，顿时使毛放弃支持张学良的明确路线。《真理报》严厉地谴责张是一个卖国贼和日本代理人，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同张的关系，使他们陷入混乱。在张学良希望得到帮助和谅解时，共产党犹豫不决、不予支持的做法肯定对少帅有影响，使他独自做出了“过早地”释放蒋委员长的决定（见博古的评论）。而这时，共产党政治局还没来得及“走曲折的路”，把服从莫斯科的命令与他们自己预先的计划和得到亟需起码的政治、物质生存条件的保证之间的矛盾协调起来，这保证指的是，利用蒋介石的被捕除掉他并分裂那些再度企图消灭他们的人。

随着蒋被释放，实际上共产党很快就再次被置于蒋的支配之下。他们除了试图依靠宣传手段来摆脱孤立，走上国家舞台，别无他法——他们已失去了同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机会。到了1937年6月，蒋介石拆散并搞乱了一度强大的东北军，把他自己的军队开进陕西，又一次封锁了红区。这种形势一定会使共产党人回忆起他们早先犯过的错误——1932年福建事变时拒绝同十九路军建立一个全面的联盟。现在，他们似乎再次面临着选择：或者全面投降，或者被围困受难，或者退向北方的荒野。同月（6月）我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答复我私下送去的一封信，在信中我问到他们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不会遭受这种命运），信中他含糊地提到统一战线的危机，表示对国民党明显地旨在全面准备恢复西北战争的政策“担忧和不满”。

张学良曾经“挽救”过共产党一次。现在这第二次好运气又为他们展现了最广阔和最有利的时机。这就是在下个月里，日本人“凑巧的”大规模侵华行动使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得收起他新



的剿灭运动的全部计划，把他们从危险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不能说毛没有从这段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也不能说这件事没有加强共产党在后来、特别是在最后夺取政权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独立性。

约翰·费正清教授是使这些长期沉睡的资料复活的魔术师。在他的建议下我才开始编辑本书，没有他的鼓励，无疑不会将这些资料付印的。我也感谢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计划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欧·埃德蒙·克拉伯，他们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赵博士不辞劳苦地核对全部中文并提供全书正确的中文姓名，而邹博士欣然用他那优美的书法为封面题词。我对伊丽莎白·玛瑟森夫人和楼聂玲夫人表示同样的感谢，她们为出版这一作品付出了惊人的大量艰苦劳动。

最后，我不能忘怀“大河彼岸的”异乡人的友好情谊，是他们使我最初的设想变成现实。

埃德加·斯诺

1957年9月于美国纽约州 帕利塞德